



## 沒有理解、何來公義？

### 論主體生成的多元文化教育

廉 兮

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 一、前言

原住民部落裡的小孩問漢人老師：「老師，為什麼客家人比我們有錢？」老師一時語塞，但他心裡偷偷的想：「如果你爸爸不要喝醉了就不去工作，你們家就可以存錢啦！」<sup>1</sup>

孩子的問題切進了我們社會的心理缺口，向孩子解釋這樣的族群階級的差異性誠非易事。壟罩在這一組師生關係之中，是社會巨大的族群社經結構差異的陰影。在規律的教學生活與穩定的薪資報酬中，老師沒能理解，底層人民處於極度身體勞動、所得低微、工作時有時無的勞動處境中，辛苦與危險的長時間工作也未必能有積累。底層勞動者的工作時間沒有比中產教師的教學時數少（遑論寒暑假），但是這個社會以不同的方式在對待他們。

社會差異結構就在眼前，而多數人錯把社會現象解讀成原因。底層勞動人民面對勞動條件極度困難的痛苦，被解讀為個人與族群的懶惰與無能。族群的汙名總與貧窮汙名相伴而至。然而兒童的困惑何嘗不是成人的困惑？這個社會說不出的痛苦在這樣的教育現場中無聲的翻攪著。

沒有理解、何來正義？誰能給誰甚麼？誰來定義誰應該受甚麼樣的教育？日常生活的瑣碎常讓我們困惑，有沒有一種視野，能讓我們了解生活的意義？有沒有一種知識能讓我們無愧彼此？有沒有一種獲致知識的方法能讓我們跨越巨大社會距離的區隔，讓人能辨識、理解與接納人我生命處境的差異，在更廣闊相連的

---

<sup>1</sup> 2009 多元文化教育課堂討論，學生反映對話。



生命視域中，集體創造差異共在的人間？這樣的提問可能從多元文化的教育視野中獲致理解嗎？

在 70 年代的台灣，閩客移民台灣的四百年歷史不在教科書之內。而台灣人當然不是只有四百年的歷史，因為「四百年」的台灣史中排除了台灣先民原住民歷史。對於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學校教育而言，意識形態本身沒有歷史。在國家意志之下的大歷史敘事中，人民不見彼此與自身的存在。

台灣從 1987 年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自主工運啟動、次年解除報禁。1994 年 4 月 10 日教改大遊行、訴求教育鬆綁。1996 年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寫入行政院教育改革諮詢委員會總諮議報告書裡<sup>2</sup>。1997 年「國家肯定多元文化」正式寫入中華民國憲法。臺灣的民主運動是人民認識自身與重建社會關係的渴望；是人民在大歷史的裂解與碎片中企圖說出自身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當然是多元的，也應該有著各種說與聽的可能。

## 二、多元文化高層論述形成的歷史軌跡

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歷史變革路徑，在北美民權運動進程中，以追求族群教育機會均等作為社會公義的實現，可以說是北美多元文化教育運動最素樸的起點。在追求族群平等對待的訴求中，少數族群教育 (minority education) 成為焦點。在這樣的歷史脈絡裡，訴求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尊重與各族群教育機會均等的倡議卻有其挑戰 (莊勝義, 2007)。

在美國推動多元文化教育的過程，實際承接了社會高度爭議的族群對立與文化衝突。因此對於多元文化教育主要的批評有兩個面向：一是國族認同的危機：恐懼國家分裂於族群認同運動之中；另一個是文化認同的危機：憂慮多元文化的課程將導致傳統經典教育價值的式微。換句話說，美國的多元文化教育是一個社會運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教育即政治、校園即是文化戰場、課程是兵家必

---

<sup>2</sup> 1996 年行政院教育改革諮詢委員會諮議報告書記載：「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在於肯定人的價值，重視個人潛能的發展，使每個人不但珍惜自己族群的文化，也能欣賞並重視各族群文化與世界不同的。在社會正義的原則下，對於不同性別、弱勢族群、或身心障礙者的教育需求，應與以特別的考量，協助其發展。」(行政院行政院教育改革諮詢委員會, 1996, p.37)



爭之地。「多元文化教育」作為教育學程的必修學分，各種形式的壓迫都被老師與學生提出檢視與討論，因此每一堂課中教師與學生都充滿了情緒的張力，教育學院公認最難上與最痛苦的課程，就是多元文化教育。

對照美國社會多元文化論述的火藥煙硝，臺灣在 1997 年當「國家肯定多元文化」正式寫入中華民國憲法時，社會卻是出奇的寧靜。社會學者張茂桂（2002）描述了那樣的歷史時刻：

因為沒有爭議，使得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而就在既缺乏讓人「驚奇」或者「驚喜」的感覺，也缺乏讓人「焦慮不安」或者「憤怒」情緒的情形下，「多元文化」靜悄悄地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以及在各種國家重要慶典，代表台灣重要的「集體表徵」。(張茂桂，2002:260)

張茂桂（2002）在整理台灣多元文化論述形成的歷史脈絡時指出：台灣民主運動過程中，建構台灣國族認同過程，政黨之間最大的公約數，呈現在多元文化的高層論述形成。然而，快速的取得國家憲法保障的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確性，與繼續推動的通行無阻，又呈現了與台灣社會常民文化實踐相去甚遠的困境。換言之，常見於政策宣稱修辭的多元文化，卻不是大眾熟悉的概念與經驗。社會學者趙剛（2006）的論文中指出「多元文化」作為一種政治的修辭與其對應的現實間的反差，清楚的指出其間的論述問題與社會不義。他問：

假如一個群體在這個社會中始終是處在一個失業或就業的邊緣，以及道德破壞、社區破壞的處境，你能夠想像這樣一個群體在這個社會中，會跟其他的群體一樣成為相互承認，相互認同的主體之一，然後一起點綴這個百花齊放的多元文化地景嗎？

臺灣多元文化修辭的政治與人民生活的文化實踐脫離的弔詭，卻是實實在在的反映了台灣社會運動的特有路徑：政治菁英與知識菁英階層以奪取現代國家權力為手段，迅及制度化與規範化新的社會價值，以達立竿見影的效果。知識菁英階層扮演替弱勢群體爭取權利的代言人角色，卻陷入了：「一邊代表受害者發言，一邊又嫌棄他們不明白自己的處境」的自我矛盾與封閉的困局（丘延亮，2002：35）。以國家權力建構真理政權的社會路徑，必竟與相信人民在其文化實踐中自主負責的教育過程是相互矛盾的。



### 三、社會一體、文化同質、弱勢競奪的想像破局

多元文化在認同政治的策略上強調少數族群經驗的特殊性，以福利制度規定保障少數族群文化的特殊性，給與弱勢族群在大社會中較有利的競爭位置。但當多元文化以特殊性整合建構國家的想像時，卻陷入以政策補償與酬賞交換與鞏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治理正當性。國家以金字塔式的社會階層圖像由上而下的灌注社會福利資源，建構弱勢競奪社會資源的想像；暗示人民爬到金字塔頂端就有最多的資源與最大的權力決定其他人的生活與命運，不幸壓在金字塔底端者就活該撿一些上面的吃剩下來的餅乾碎末聊以解饑。社會福利系統、中小學教育及至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資源皆以社會階層管理法則進行社會分配。個人與個人、群體與群體在相互競爭中成為彼此生存的威脅。（不要讓你的孩子輸在起跑點！單親爸爸團體被要求跟單親媽媽團體分奪社福資源！）立意良善的多元文化的認同政治，反而卻強化了主流價值的威脅感與弱勢競奪的圖像：建構「我們」與「他們」在文化上互不相屬、更是社會資源的競爭對手的想像與集體恐慌。

教育學者張建成（2007）曾以「獨石與巨傘」的意像描述多元文化主義論述的難題與他的擔心。他以「獨石」比喻文化被解讀為孤立於社會關係的單一系統，造成群體與群體之間有如文化孤島一般的圖像。又以「巨傘」的意象比喻多元文化主義論述在社會機會均等的大傘下，弱勢團體競相而出、以致無限擴張其論述範疇。我以為這樣的擔心呈現了把多元文化作為類別性的思考（categorical thinking）所產生的恐慌。多元文化主義也許既非太「過」、也不是「不及」的問題。讓我們去看看多元文化是否可以不是一組集合名詞，而是集體對話歷程，一個現在進行式的動詞，一種人民對其處境關係的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與文化實踐歷程。

### 四、肯認差異的文化民主：作為現在進行式的多元文化反思與實踐

人類學者 Terence Turner（1994）認為當代多元文化的認同政治陷入文化同質化與浪漫化的陷阱，反而忽略了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文化反思意涵與實踐力量。他認為人類學的「文化」內涵，是「來自於歷史與社會進程的脈絡中，社會意識



覺醒的集體形式。」(p.412) 他從文化能動的角度來看，「文化意味著一種積極能動的集體自我創造與發明」(p.422)。帶進文化批判與實踐意識的觀點，他認為對於多元文化主義者來說，「文化，指涉的是一種為社會的平等而進行的集體社會認同的鬥爭。」他因而提出批判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把差異作為對話基礎的文化民主過程：

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尋求把文化的多樣與差異作為一種基礎，去挑戰、修正與恢復那，對於宰制與少數文化都是普遍一致的，基本概念與原則，以便於建構一個更朝氣蓬勃、開放與民主的共同文化。(Turner, 1994: 408)

有別於認同政治訴求我族的特殊性，肯認差異的政治朝向理解人我之間差異與多元處境，尋求跨越差異的界線、反思鬆動意識形態文化霸權的網羅，在相互參看中獲致理解與共同生活的可能。這個觀點在亞蘭·杜漢(2003)所寫「我們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異」一書中更見清晰。他說：

人們越是把多元文化的社會想像為文化與社群的遭遇戰，則圍繞著移民問題挑起激烈的衝突的機會便越多；反之，如果人們越是努力把不同的文化按已有的經驗和個人的生活計畫聯合起來，則成功的機會便越大。(2003: 260)

他指出：

多元文化的社會能把一個社會組織的統一性與歸屬的多樣性及文化的參照因素結合起來。這段話的意思，可以這樣歸納起來表達：我們在一起生活、一起勞動、而又互相承認我們的文化差異。(2003: 262)

亞蘭·杜漢建議我們把他人的處境看作與我們大家都相關的社會真實，把文化的解放與文化的交流連結起來思考，他建議我們應該：「對那些遭遇到當初現代化運動排斥或壓制的文化現象重新加以詮釋。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的困難，就是一切民主事務所遇到的困難，因此，應當把解放運動與對他者和多元的承認結合起來」(亞蘭·杜漢，2003: 267)





在花東地區有著豐富的族群文化與頻繁的族群互動，但是即便在東部原住民人口達三成的地區，漢人給予原住民負面評述並不曾稍減（張茂桂，2002）。因此承認人們的利益、觀點和價值觀多樣只是一個認識的開始。更重要的功課是對現代化資本主義社會系統所排除的文化觀點重新詮釋。以貧窮文化為例，如果以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想像所進行的國家治理，不難發現政策觀點多為如何界定貧窮或提升貧窮線，抑或要找到有效根治的辦法以消滅貧窮。但是貧窮作為一種社會治理的機制，正是透過化分「有」與「無」之間的區別，進而製造社會權力中的劣勢（張少強，2004）。這在 Charles Taylor（1994）申論階層社會結構中榮耀的給予概念也其理至明。也就是說榮耀來自於多數人的無與少數人的有，從而建立其稀有性與尊貴感。

在資本主義社會建構的拜物文化中，師生無論原漢皆無可避免的以貧富作為幸福生活的度量衡。因此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裡，布農族女性選擇以記錄自身部落的小米耕種文化，探究在物質貧困中，自足的部落生活與生命哲學、部落兒童在家戶往來之間集村共養的社會與教育意義。穿梭在漢人學術與部落生活界線之中的布農族女性研究生，描述了部落老年婦女在採集文化中的自在與堅毅，從而展現了貧窮文化中人民自主的堅韌生命力（余桂榕，2009）。這樣的文化視野在張少強討論貧窮文化時有著豐富的描述。他描寫貧窮生活中的人們是「有聲音、有自我與有主體身分的個人。……用自己的省思與實踐討回生活的意義，在乾涸的日常土壤上展現人間的情愫，在人們以為不可活的場域中構築可活（livable order）的秩序，以致於在物質領域之外創造存在價值與意義」（張少強，2004：35）。當人民以其文化生活中的自我覺識進行教育交流，在彼此生命處境的差異中相互參看學習，這便是多元文化的民主對話歷程。

## 五、主體生成的多元文化教育：人民處境差異中的相互理解與連結

人類學者丘延亮（2002）在給亞蘭·杜漢「行動者的歸來」中譯本的序言中，提出「希望的主體」就在眼前之說。文化民主的過程需要回到人民生活的文化實踐基礎與條件來看。要重建我與他者的民主生活與交往關係，首先來自於一種意



願：「一種首肯和顯身的意願，一種把他人當作人（包括承認他們的歧異和他們所抉擇）的意願。」（丘延亮，2002:11）。在重建我與他者的交往關係之中，當個人願意選擇面對自我內在的他者性，同時也肯定他人的主體性時，人我之間的我們才得以成為倫理主體。因為主體追求的是自由與責任，而不是維護既存的社會道德秩序。

當我們把教育作為一種公共的學習空間時，教育者所要創造的是公共空間中異類相容的對話條件。多元文化的教育所彰顯的是師生從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踐中，探問彼此與自身的倫理關係，在人我文化差異的邊界中，致力於創造相互理解與連結的可能，抵抗均質的社會想像所帶給個人與集體的壓迫，從而回復人們自由交往與廣泛連結的生命力量。

### 參考資料

- 丘延亮（2002）。希望的主體－杜漢的社會性運動論詰與台灣社會性蛻變。選自舒詩偉等譯，亞蘭·杜漢著，《行動者的歸來》。頁 7-46。台北市：麥田出版。
- 阿蘭·圖海納（台灣譯名：亞蘭·杜漢）（2003）。我們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異。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
- 張少強（2004）。扣連貧窮文化－貧窮文化能是甚麼？選自丘延亮譯，奧斯卡·劉易士著。《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台北：巨流出版。
- 張建成（2007）。獨石與巨傘－多元文化主義的過與不及。《教育研究集刊》，53（2），103-128。
- 張茂桂（2002）。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在台灣形成的難題。收錄於《台灣的未來》。頁 223-272。薛天棟主編，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叢書（1），台北：華泰文化事業公司。
- 莊勝義（2007）。機會均等與多元文化兩種教育運動的對比。《高雄師大學報》，22，21-42。
- 趙剛（2006）。多元文化的修辭政治和理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6，249-190。
- 余桂榕（2009）。採收自在：布農部落婦女生活教育的故事。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多



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

Turner, T. (1994) .Anthropolpy and multiculturalism: What is anthropology that multiculturalists should be mindful of it? In D.T. Goldberg (Ed.), *Multicultu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pp.406-425) . Oxford UK: Backwell Publishers.

Taylor, C. (1994)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C. Taylor & A.Gutmann (Eds.) *Multiculturalism*. (pp.25-73)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